

# 《论语义疏》与皇侃“叙”在德川时代日本的复活及其在浙东的刊印<sup>1</sup>

Benjamin A. Elman 艾尔曼

## 论文提要

十八世纪东亚的经学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文献学家的引领下，音韵学也随着汉语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更加富有科学性。从语言学角度对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五经》进行分析，在清朝（1644-1911）的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1600-1867）的日本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清代的中国为主，还要加上德川时代的日本，共同对朝鲜时代（1392-1911）的韩国产生了影响。<sup>2</sup>

从某种程度上说，十七、十八世纪贸易（中日之间）和纳贡（中朝之间）的往来，日用品、书籍以及知识在三国之间的交流，标志着 1800 年以前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文献学者在东亚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大庭修曾经描述过 1680 年代以后，随着满人的统治逐渐安定，宁波-长崎之间数量相当可观的贸易往来。日本学者和幕府将军们渴望得到在中国出版的最新的经典著作和医术，一些在中国已经长期失传的珍本图书仍然可以在日本找到，这也是很多有学术兴趣的中国商人乐于寻找的商品。<sup>3</sup>

我在下文将会首先描述日本在十八世纪对儒家文献的校勘整理，以及他们通过长崎对宁波的贸易而对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回顾之后，我将专注于讨论德川时代日本重新收集到的《论语》在中古时代的版本，及其进入清代中国的途径，该书在 18 世纪 50 到 60 年代之间进入浙东，到 80 年代被收入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这个比较晚近的例子迫使我们重新估价十八世纪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商业背景。

## 1. 日本人对古代抄本的兴趣

对于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9）来说，儒家经师的权威在于他对中国文言文的熟练掌握，能够通过一系列实践性的语法练习带领学生逐步提高。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日本的文献学家都是标点、音韵、训诂的高手。最高级的教授用《汉文》作为教材传授《四书五经》中圣人的教诲，该书是日文版的中国古代经典，有专门的注解来解释

<sup>1</sup> 感谢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帮我在日本找到一手和二手的材料。2006 年 6 月我访问足利学校的时候，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吴格主任陪同的。我在 2008 年夏天完成的这篇文章得到了 2007-2008 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以及蒋经国基金会 2008 年夏季的支持。

<sup>2</sup> 见 Elman, "From Value to Fact: The Emergence of Phonology as a Precise as a Precise Discipl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2.3 (July-October 1982): 493-500 页。以及夫马进“一七六四年朝鲜通信使と日本の徂徕学”，《史林》89，5（2006 年 9 月号）：645-677 页。

<sup>3</sup> 见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期舍，1984 年）；亦可见 Roy Andrew Miller, "Some Japanese Influences on Chinese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the Ch'ing Peri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2, 2 (April-June 1952): 60-61, 以及胡孝德《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 1 期）：142-49 页。

段落内容；次一级，更为技术化的教授用他们的文言文知识传授医学和算学经典。

在十八世纪早期，这些文献学者都知道位于关东平原，江户之北的枳木城有一所足利学校，那里收藏有室町时代的儒学抄本，以及很多来自宋代中国的善本。比如 1750 年服部南郭（1683-1749）为他的同事根本逊志（伯修 1699-1764）所整理的《论语义疏》所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提到“足利之藏……于今海外后世所不传异书”。这些收藏吸引了江户一带获生徂徕一派学者的兴趣。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对者，同时也是佛教的批判者，获生一派的学者很难看到镰仓或者京都的禅宗寺院中收藏的图书。获生的追随者们出于这种不得以的原因，只能把足利学校当作他们的资料馆，并且长期、频繁地驻扎在这里钻研他们重新发现的经典著作。<sup>4</sup>

举例来说，其中有一位学者太宰春台（1680-1747），原本是宋儒的门徒，后来改变想法去学医，再后来才转向研究中国的古文经学。对于平民来讲，学者掌握少量经典文本是使得他们逃脱底层人民所能从事的卑贱职业的方法。他们要具备炼词造句的能力，使得自己和学生能够像服部南郭那样以写作使自己名利双收，或者至少可以教别人写作。<sup>5</sup>

在写作和讲话中所展现的古典文献知识在十八世纪成为一种名誉的标志，所以这也吸引了德川时代各地封建主对于行政写作班子的需求。儒家学者们通过一个改变中的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提供语言和价值标准。曾经完全是贵族和武士的统治阶级，如今和那些接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共享精英地位。儒家的“文”标志着日益提高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研究为学者和他们的弟子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渠道，尤其是那些进入都市赞助人关系网络，获得财产和声誉的人。经学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谋生的职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那些学者想像他们甚至可以在经典研习方面超过中国学者。<sup>6</sup>拥有大量学生的经学教授，比如获生徂徕和伊藤仁斋通常是赞美中国的。徂徕认为，德川时代的分裂状态与圣人时代的中国更为相似，因此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回到古典时代。徂徕把自己看作是带领日本重回古典之路的不二真正继承人，他认为这一道路在中国已经丧失了。<sup>7</sup>

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家学者试图通过将儒学去中国化，从而使中国的圣人之道日本化。这一策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古典本位的教育从而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伊藤仁斋采取这种方式以确认日本的儒家价值高于中国。他相信日本能够实现这些已经被中国抛弃的价值观和理想，而中国因为背离经典已经自我夷狄化了。仁斋还强调日本统治者的连续性正好与中国频繁的王朝更替形成对比。即使日本从未中断的皇室在道德上优越于中国，这一方式仍然意味着日本是在引进中国的价值标准和范畴。仁斋和徂徕两人都把他们的亲华情绪内化为“日本化”，并且将其转变为反对中国。<sup>8</sup>

## 德川时代早期对足利藏书的利用

像十八世纪很多经学家一样，一位医生的儿子，伊藤东涯（1670-1736）和获生徂徕两人的学生山井鼎（昆仓 1670-1728）1720 年到 1722 年之间在根本逊志的陪同下在足利学校

<sup>4</sup> 服部南郭：《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见根本逊志《论语义疏》（大阪：怀德堂，1750 版），1a 页。

<sup>5</sup> Ann Janneta, *The Vaccinators: Smallpox, Medical Knowledge,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3-104. 关于太宰春台，见小島康敬“解説”，收入太宰春台《春台先生柴芝园稿》（东京：べりかん社，1986 年再版，1752 年原版）5-6 页。

<sup>6</sup> 见 Elman, “Sinophiles and Sinophobes in Tokugawa Japan: Politics, Classicism, and Medicin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台湾) 2, 1 (2008 年 3 月号): 93-121 页。

<sup>7</sup> 关于获生徂徕，见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德川时代中期日本的三位经学家》（东京：岩波书店，1983）87, 198, 201-205 页。亦可见大庭脩“获生北溪·徂徕と楽書校閲”《东方学》91 期(1996 年)。

<sup>8</sup>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p. 22-27.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游学的时候，掀起了德川时代日本的第一次著名的经典发现热潮。他们俩人当时都已经是徂徕的弟子，到足利学校去查阅经典抄本。他们共同努力，在那里找到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使得山井鼎能够汇编成《七经孟子考文》三十卷。在编辑工作结束的时候，获生徂徕为之撰写了一篇大加称赞的序言，因为这些资料在中国都已经失传了。他指出山井鼎已经用了三年的时间在足利学校辛勤地阅读抄本。服部南郭后来提到，在这段时间里，根本逊志也开始整理《论语义疏》抄本，山井鼎也曾经整理过他所发现的不同版本的《论语》。<sup>9</sup>关于这一情况稍后再谈。

1728 年山井鼎去世后，德川幕府将军吉宗（1684-1751, 1716-1745 在位）要求徂徕的弟弟获生北溪（1669-1754）对该书进行扩充和校正，北溪当时以医生的身份为德川幕府效力。吉宗资助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在 1732 年的出版刊行。这位将军后来又让长崎的地方官员将 32 卷本的考文和 200 卷的补遗送到了浙江宁波，但是这部书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那个时候，中国的学者意识到《七经孟子考文》第一次证实了：某些中国古典文献，比如皇侃（488-545）的注疏，在中国已经失传，却仍然保留在日本。<sup>10</sup>

山井鼎增补的七部经典（《周易》、《尚书》、《毛诗》、《左传》、《论语》、《孝经》和《孟子》）在清代中期的中国普遍受到考据学家们的欢迎，因为这些典籍都是以保存在足利学校号称可靠的日本古抄本为基础编辑而成的。一些活跃于宁波-长崎贸易线路上的浙江书商来到日本港口的时候，开始寻找其他书籍。随后，杭州的盐商兼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9?）把山井鼎的作品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收入北京的皇家图书馆。<sup>11</sup>

北京的四库馆臣热情地接受了该书，并将其重新编辑为 206 卷，收入四库，但起初他们并不知道作者是日本人。也把日本的出版日期错弄成了山井鼎出生的 1670 年。这一错误由扬州士大夫阮元（1764-1849）改正过来，他在整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期间，于 1810 年遇到了金正喜（1786-1856）。金当时来访北京是因为参加 1809 年的纳贡使团。作为第一个认识到山井鼎作品的重要性的朝鲜人，金送给阮元一部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的原始抄本，这是他随朝鲜使团出使日本的时候抄录的。<sup>12</sup>

四库馆臣也很乐于找到山井鼎的版本与晚明丰坊（1493-1566）所编版本的异同之处，丰的辑本也自称来自海外的可靠版本。吊诡的是，乾隆朝的清代书商用十八世纪的来自“海外”的日版儒家经典验证出十六世纪丰坊的版本是伪作。从日本方面的观点来看，山井鼎的辑本表明了日本学者在古籍整理方面已经可以和中国学界抗衡了。<sup>13</sup>

## 古文《孝经》

步山井鼎的后尘，太宰春台也到足利学校游学，并发现了一个《孝经》的孤本，号称可

<sup>9</sup> 服部南郭：《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1a 页。亦可见狩野直树“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支那學文叢》（东京：弘文堂，1927），178-209 页，以及野田文之助的“山井崑崙と七經孟子考文稿本について”，《東京支那學報》1（1955 年 6 月）206 页。

<sup>10</sup> 见《四库全书》版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凡例”中提到“皇侃義疏論語”，6b 页。徐望駕：《論語義疏語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202-203 页，将皇侃义疏在中国失传的时间定在 1190 到 1261 年间。

<sup>11</sup> 狩野直树“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126-136 页。亦可见大庭脩“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Edo Period, Part Six. A Profile of the Unruly Shōgun Yoshimune,” *Sino-Japanese Studies* 10, 2 (April 1998): 43-59, 以及吉川幸次郎的《仁斋、徂徕、宣长》149-151 页。

<sup>12</sup> 见《四库全书》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提要”（經部七），1a-5a 页。以及皇侃《论语义疏》的“提要”（經部八）2a 页。还可见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中文馆书店，1947 年），26-27 页，以及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149-151 页。

<sup>13</sup> 见《四库全书》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提要”，4b-5a 页。关于丰坊一案，可见 Bruce Rusk, “The Rogue Classicist: Feng Fang (1493 - 1566) and his Forgeries” (Los Angeles: UCLA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2005).

以追溯到秦火之后重新发现的孔壁藏书（约公元前 154-128）的古文经。1732 年，太宰在日本出版了他整理的《古文孝经孔氏传》，他认为这是西汉（公元前 202-公元 8）孔安国（约公元前 156-100）的传本，六世纪中期已经在中国亡佚，到六世纪末期（正当隋代 581-618）神秘出现，五代（907-960）时候又再次亡佚。<sup>14</sup>

隋代的版本在七世纪传到日本，原本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又于 860 撤回，因为其传承过程遭到质疑，被认为是唐代（618-907）的版本。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孔传遭到双重质疑，因为多数学者认为孔安国从未做过任何形式的经传。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孔传的第一个版本也是可疑的。然而，相关的抄本保存在日本，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足利学校。

太宰春台坚称他于 18 世纪 20 年代在足利学校发现了可以定为隋代的古文经。随后他在 1732 年将之出版，他完全知道该版本已经在中国失传。他坦白地希望这一亡佚的经传能够像山井鼎的作品那样，以官方渠道正式从长崎传至中国，春台在 1733 年正式向沼田（足利学校所在地）的大名提出请求，希望找到长崎的官员能够把他的刊本送到宁波。不清楚太宰的哪一个刊本找到了进入中国的途径，但是该书最终在 1776 年第一次被清代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并正式刊行。太宰的作品随后也被收入四库。<sup>15</sup>

1778 年，一个清代商人将再版的《知不足斋丛书》带到长崎，这一版包括了一些清代学者称赞太宰作品的序言，不过他们仍然表示对汉代的孔传持怀疑态度。1781 年，清代学者卢文弨（1717-1796）、吴騫（1733-1813）、郑辰的序言，以及鲍廷博的原版跋语作为单独一卷在江户重版。富有影响的文学和艺术赞助人木村蒹葭堂（1736-1802）为春台的作品在中国出版写了一篇高度赞扬的序言。日本重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中所收春台的《古文孝经孔氏传》也在次年发行，附有一篇春台的弟子大塩齋渚（1717-1785）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

春台的作品在清代中国也激起了一些文献学家指责他作伪。与我在下面即将讨论的后来对皇侃的《论语》义疏所持的肯定态度不同的是，大多数清代考据学家简单地把太宰的孔安国传看作原始伪作的晚期伪作。另一方面，这两部著作在日本的刊行巩固了太宰春台在德川时代的学术圈中，作为文献学家和博学者的美誉。而他在中国作伪的名声也为他在日本学术圈的美誉起到了巩固作用。此外，徂徕学派对当时日本把宋代朱熹（1130-1200）整理的文本毫无批判地奉为经典教材进行攻击，山井鼎对于早期抄本的使用，以及太宰对汉代古文经文本传统的回归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春台整理的《古文孝经》颠覆了仅仅能追溯到宋代的程朱版本《四书五经》的权威性。春台整理的孔传迅速在全日本再版，并且很快就成为德川时代最流行的《孝经》版本。该书的成功随即激起了大量日本学者成为孔传的研究者，既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事实上，春台通过重新发掘足利学校所藏的古文《孝经》，使得他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超越了宋儒。一部来自中国的经典在亡佚之后，又在日本被抢救回来了。<sup>16</sup>

## 今文《孝经》

太宰春台在日本名声大噪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日本学者越来越多地寻求其他亡佚的注本，比如《孝经郑注》，在 1801 年一经发现立即从日本传至中国，并被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劳拉·海丝（Laura Hess）指出：与更多受到的怀疑的孔安国古文《孝经》相比，这一

<sup>14</sup> Hess, "The Reimportation from Japan to China of the Kong Commentary to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pp. 4-5.

<sup>15</sup> Laura Hess, "Qing Reactions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nfucian Canonical Works from Tokugawa Japan," in Joshua Fogel, ed.,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ited. (Norwalk, CT: EastBridge Press, 2002), pp. 135-140.

<sup>16</sup> Hess, "The Reimportation from Japan to China of the Kong Commentary to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pp. 6-7.

所谓的郑玄（127-200）注今文《孝经》得到了清代文献学家较大程度上的接受，虽然也有一些保留。这一更加积极肯定的接受，部分是因为郑玄的地位在十八世纪中国文献学家心目中得到了提高，被当作后汉时代曾经注释了大多数儒家经典的重要的经学家。他被考据学家看作“汉学”之父，而且他们主要依靠他的注释来理解五经的字词之意，从而代替宋儒所倡导的“义理”之说。<sup>17</sup>

郑注也曾经在五代时期的战乱中在中国失传。宋代的时候从日本重新引进，随后又再次失传。在日本，一个看似可信的版本在天明朝（1781-1789）发现于《群书治要》，这是唐代一部重要的丛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几个世纪，而名古屋的统治者把日本保存的版本整理并出版。文献学家们在整理过程中认出了保存在该唐代丛书中的《孝经郑注》。

冈田新川（1737-1799）并非第一个在日本出版郑注的人，但是他的辑本是第一个被送到中国，带着也能够有幸获得出版的希望。当冈田的版本在1794年出现的时候，一些学者质疑其为伪作，因为其中缺少一些其他传世本中所保留的郑注，也有一些清代学者为之辩护。不过由于在日本没有广泛的再版，考据学家们在1847年以前都没能够确认这一辑本其实是一个郑注节本的可靠来源。到十九世纪后期，清代学者已经能够通过其他来源为这一日本版的郑注进行增补。

尽管在中国得到了肯定的接受，但是德川时代的学者并不认为冈田新川的作品与山井鼎、太宰春台，或者根本逊志的作品水平相当。徂徕学派的后代学者认为后者才是他们的大师，因为其具有颠覆权威的力量，其作品能够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在日本的学术圈中广泛传播，并且能够激发别的学者的热情去整理其他在中国失传的作品。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一批新的更为折衷的经典学者出现了，他们视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及其学生仅仅是语言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对他们持贬低态度。<sup>18</sup>

## 2. 日本重新发现的中古时代《论语》

德川时代日本重新发现的中国古典文献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梁代（502-557）皇侃为《论语》所作的注疏，我们今天称为《论语义疏》。<sup>19</sup>南方的文献学家皇侃在当时道教和佛教的双重影响下写作，他本人就是个佛学专家，他把自己的注释加在曹魏（220-265）何晏（190-249）的《论语集解》之后。<sup>20</sup>皇侃的义疏在南宋（1127-1279）失传，却传到了日本，保留在藤原佐世（死于898）九世纪晚期的目录书《日本国见在书目》中。<sup>21</sup>

此后，皇侃的《论语》注疏以抄本的形式在日本的学术机构之间传抄，比如足利学校、大阪的怀德堂，还有把儒家经典当作僧人重要课程的佛教寺院，比如京都的曼殊院。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日本《论语义疏》的抄本有三十五种传世，大多属于室町时代（1333-1573）。用这些抄本，高桥均在1971年，影山辉国在2006年整理出了《论语义疏》的新版本，非常引人注目，代替了武内义雄（1886-1966）曾经用十一份抄本整理出的旧版本，该版本于十

<sup>17</sup> 见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nd edition.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1), pp. 146, 162.

<sup>18</sup> 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響”《史學雜誌》10 (1914), 290 页。以及金谷治，“日本考證學派の成立：大田錦城を中心として”，收入金谷治《中國思想論集》（东京：平河出版社，1997），卷3，238-290 页。亦可见 Hess, “Qing Reactions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nfucian Canonical Works,” pp. 144-149.

<sup>19</sup> 藤塚鄰，“日本刻皇侃論語義疏の清朝經學に及ぼせる影響”，《漢學會雜誌》8, 3 (1940): 291-328 页。

<sup>20</sup> 何晏所组织的这一集解汇集了八种前人对《论语》的注解。见 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3-29. 以及 Daniel Gardner,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17.

<sup>21</sup> Hess, “Qing Reactions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nfucian Canonical Works,” pp. 140-144. On Liang cultural life, see 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九和二十世纪曾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为定本。<sup>22</sup>

清代最流行的根本逊志整理的《论语义疏》出版于《知不足斋丛书》系列。鲍廷博于1788年在浙江省会杭州将此书编辑为十卷本出版。<sup>23</sup>更早的时候，鲍曾经帮助当时的浙江布政使王宣望（死于1781）整理《论语义疏》，并刊刻木版，于1775年左右出版。王宣望刊刻的中箱本以前面提到的徂徕的追随者根本逊志所整理的皇侃注疏的《论语》为底本。该书1750年在大阪出版，也是十卷本。<sup>24</sup>

杭州的儒商汪鹏曾经在1764年前后在长崎购买过根本逊志的辑本，并将其带回到宁波（明州），这是当时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主要港口。他回来后，将根本逊志的辑本呈给杭州的浙江省府，但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王宣望将这一日本的辑本进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但在尚未刊刻之时也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七年后，王宣望因腐败被收监，并于1781年自杀，根本逊志的辑本却在随后被收入了北京的四库。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很可能就是王宣望最先在他整理重印的版本时，去掉了所有和日本有关的内容。在那之后，皇侃的注疏在十三世纪消失之后又真切地重现，并且在当时影响了很多优秀的清代考据学家。<sup>25</sup>

William Boltz 近期曾经专门研究过皇侃义疏的“叙”，因为该篇叙言中有一段内容是皇侃专门用成熟的音韵学方法来解释，为什么会选择“论语”两个字来作圣人教导七十一位亲近弟子的言论集的题目。皇的方法论和语言学分析使得他对“论”字的解释在中古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这使得日本学者对这一失传已久的中古时代《论语》注释的重新发现具有双重重要意义。<sup>26</sup>

按照皇侃“叙”的说法，先儒为“论语”的题目定字有“三途”，即三种方式：

1. 捨字制音，
2. 捨音从字，
3. 伦论二称，义无异也。<sup>27</sup>

第一种方法指出“论”字的选择是音韵优先于文字。皇侃“叙”中将其训为同音字“伦”，与“论语”之“论”相通之义有：1)“次”，即“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2)“理”，即“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3)“纶”，即“言此书，经纶古今也”；4)“轮”，即“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sup>28</sup>

第二种方式与第一种正相反，认为“论”字的意义决定于其字形。在这一原则中，不必了解字形演变历程背后的音韵学历史。相反，对字形的分析揭示出“言此书出自门徒，比先

<sup>22</sup> 高桥均，“論語義疏皇侃序札記”，《漢文學會會報》30期（1971年3月）：1-14頁。以及影山輝國“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皇侃自序”，《實踐女子大學文藝資料研究所年報》別冊，10期（2006年3月）：49-74頁。對比武內義雄“梁皇侃論語義疏について（上中下）”，《支那學》3期（1922年）：100-109, 226-237, 280-291頁。武內義雄列舉了二十種日本現存的抄本，他被確信使用了其中的十種，但據影山輝國研究，他實際上使用了十一種，51, 61n2頁。亦可見陳金木，《皇侃之經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159-170頁。陳也列舉了日本和台灣所見的三十五種抄本，但是他並沒有看到日本的抄本，只是借用了影山輝國的出版成果，徐望駕的《論語義疏語言研究》也是如此，205-215頁。

<sup>23</sup> 見中國版十卷本《論語義疏》的皇侃“叙”，收入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杭州，1776-1823年版）七集，1a-6a頁。現存最早的《論語義疏》發現於敦煌，伯希和3573號，但這一抄本不完整，而且不包含皇侃叙。除了敦煌抄本以外，其他所有的版本就是依照南宋刻本的格式，正文用大體，每行占一欄，注疏用小體，每兩行占一欄，見圖7。

<sup>24</sup> 日本版根本遜志整理的《論語義疏》也是十卷本（大阪：懷德堂，1750年版），叙言見1a-6a頁。關於其討論，可參見藤塚鄰，“日本刻皇侃論語義疏的清朝經學に及ぼせる影響”，303-310頁。亦可見嚴紹璽，《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52-262頁。

<sup>25</sup> Bernhard Führer,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and the Commentaries Deviates Greatly from Current Edi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Version of Huang Kan's *Lunyu yihu*, in Führer, ed., *Zensu: Text und Autorität in China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19-38.

<sup>26</sup> 皇侃“論語義疏叙”，《論語義疏》2a-3a頁（《知不足齋叢書》本）。

<sup>27</sup> 徐望駕的《論語義疏語言研究》中對於《論語義疏》皇侃“叙”所談用字問題給予了歷史性的評價，但是沒有提到其具體的觀點。

<sup>28</sup> 皇侃《論語義疏》2a-2b頁（《知不足齋叢書》本）。



相论，人人金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因而“论”字代表了弟子们试图收集、验证，并且记录孔夫子说的话，以传之后世。<sup>29</sup>

在第三条原则中，所依赖的是语言的比较，显示的是同一意义在地区上的书写差异，比如不同的文字在北方和南方表达相同的意义。因此，字体的不同反映的是地理差异而不是音韵学或者文字学因素。所谓的“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也就是说南方人用第一个“伦”，而北方人用第二个“论”字。<sup>30</sup>

在这三种他从更早的文献记载中总结出的《论语》定名的可能性中，皇侃加入了自己的案语，指出了《论语》的语言问题。皇主张“三途之说，皆有道理”，但是最后一种看起来最无力，因为“南北语异，如何似未详”。因而皇总结说对“论”字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既“从音”，又“依字”，“二途并录，以会成一义”。<sup>31</sup>

皇侃在这里部分地依赖于早期文字学家许慎（约 58-约 147）的《说文解字》中所讲的“六书”。《说文解字》收录了 9353 个汉字条目，还有 1163 个“重文”异体字，分布于 540 个部首中，Boltz 称之为“一个理解中文书写系统的概念性发明”。“论”是个会意字，一般表示成“A，从 X 从 Y”。因此“论”的部分意义来自其读音“伦”，部分意义来自其字形组合“从言从仑”。皇侃正确解释了“论语”这一题目中“论”字的音韵学和文字学含义。<sup>32</sup>在公元六世纪，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3. 问题

皇侃总结的三种相互重叠的原则涉及音韵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这些学问在十八世纪被中国南方的考据学家大大提高，其中也有日本和朝鲜文献学家的功劳。清代的考据学家，比如卢文弨欣然欢迎日本版的皇侃“叙”，并且将其与太宰春台的《孝经》相对比。<sup>33</sup>而皇侃“叙”的独特和精彩之处还在于他自己提出的两条简洁的语言学方法论，即“捨字制音”和“捨音从字”。或许这一理论的提出显得有些过于早熟了？

迄今为止，我尚未在乾隆以前中国传世的任何版本的《论语义疏》中，找到能够和皇侃在上面总结的那几条原则相媲美的理论建树。所有使用了这一组术语的中文文献都是引自 1750 年根本逊志的德川日本版。比如《说文解字》就只有“从音”或者“从字”之说。<sup>34</sup>根本逊志的友人山井鼎编辑的颇具影响力的《七经孟子考文》收录了《论语义疏》，但没有收录皇侃的“叙”，不过，山井鼎的整理本在被送到中国之前于 1732 年经增补出版。我们已经注意到，增补后的《七经孟子考文》也被收入了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sup>35</sup>

<sup>29</sup> 同上 2b 页。

<sup>30</sup> 同上 2b 页。

<sup>31</sup> 同上 2b 页。亦可见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pp. 89-91.

<sup>32</sup> 皇侃《论语义疏》2b-3a 页。见 William Boltz, "Shuo wen chieh tzu," 收入 Michael Loewe 编辑,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ey, C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p. 429-442.

<sup>33</sup> 见高华长, “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 《中国典籍与文化》65 期 (2008 年 2 期): 4-11 页。

<sup>34</sup> 我在电子版《四库全书》(1788 年版)中搜索这两个术语, 只显示出乾隆版《论语集解义疏》, 就是以 1750 年日本版为底本的。在电子版的《古今图书集成》(1728 年版)、《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 还有《国学宝典》中搜索, 这些电子资源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乾隆以前的“搜索项”。只有“舍 (= 舍) 字, 从音, 从 X”等等, 分开表示的内容, 并没有皇侃使用的术语所表达的语言学意义。我在准备这篇论文的前期曾经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06 年 12 月 19 日), 耶鲁大学的东亚学会 (2007 年 2 月 5 日), 京都大学的中文系 (2007 年 10 月 11 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 (2007 年 12 月 12 日),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 (2008 年 1 月 24 日) 等地讲学, 邀请我的听众们共同在乾隆以前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寻找这一词汇, 最终都没有确定的发现。

<sup>35</sup> 见《四库全书》版《七经孟子考文补遗》176.1a-2a 页, 以及野田文之助“山井崑崙と七經孟子考文稿本について”206-208 页。

“捨（同舍）”字在古汉语中的典型用法是描述某人在本该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错误或者愚蠢地做出了其他选择的情况。比如《韩非子·饰邪》中提到“夫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sup>36</sup>中古时代的用法与之相似，而且多用来指语言，比如词组“捨字”。三世纪早期，《维摩诘经》的第一个中译本内，“捨文字”这一词组出现在佛祖与须菩提谈话的近末尾处：“悉捨文字，于字为解脱”。<sup>37</sup>

随后，这一词组不断出现在晚唐和宋代与禅学有关的佛典中。比如我们可以在九世纪宗密圭峰（780-841）大约在823到828年之间为《华严经》所作的“原人论序”中，发现这样一段很清楚的元语言学理论：“经云：‘文字性空’。又曰：‘无离文字而说解脱’。必曰捨文字。然后见法。”<sup>38</sup>

韩愈（768-824）激烈反对819年为迎佛骨在当时首都长安的大街上举行仪式，那篇著名的《原道》就是在这刺激之下写出的。乾隆四库本收录的这篇名作中，有一个版本附有宋代学者楼昉（活跃于13世纪）对此文的高度评价，认为韩文有力地批判了佛道的荒谬论调“佛老有开闢纵捨文字”。这一南宋时代的观念与九世纪早期佛道思想中的“捨文字”相关联。佛道思想包含了一些元语言学的观点，从免却文字到获得开悟，再到“无文字无以明开闢”。宋代禅学的标语“不立文字”经常被误解为其字面意思。另一方面，“文字禅”的诗学审美标准在当时也非常流行。<sup>39</sup>

编辑于十二世纪的《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的问答记录，其中讨论道德伦理观念的时候也使用了“捨”字的这一含义。他在这里追随的是孟子。在引述了一段经典之后，朱熹对他的弟子们说：“捨心则无以见性，捨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sup>40</sup>

与之类似，成书于十六世纪早期的王阳明（1472-1529）与其弟子的谈话录《传习录》中，也使用“捨”字来作道德伦理上的选择。比如他说：“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王阳明在答复一名学生的来信时，也使用了相同的用法：“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sup>41</sup>

清代鼎盛时期以博学著称的考据学家钱大昕（1728-1804）谴责宋明理学家诋毁“数”的时候，也使用了“舍”字的这一含义：“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家辄訾为小技，舍九章演先天，支离传会，无益实用。”<sup>42</sup>

我们也可以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找到“捨（舍）”字的相似用例。比如荻生徂徕在一篇批评老子误解圣贤如何从道的文章中指出，老子“舍物而言其名”。<sup>43</sup>另外一个例子见于伊藤东涯的儒学著作中。在他1761年版的《绍述先生文集》中讲到读书的普通实践而非文献学

<sup>36</sup> 《韩非子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59页19/3/15，以及Wilmar Mogling所译*Die Kunst der Staatsführung: Die Schriften des Meisters Han Fei* (Leipzig: Gustav Kiepenheuer Verlag, 1994), p. 154. 还可见Jean Levi, “Han fei tzu,” in Michael Loewe,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p. 115-124.

<sup>37</sup> 见《大正藏》474, 14册522a-522b页。支谦所译(223-228)《佛说维摩诘经》卷三，佛祖与须菩提论法的结尾部分。相似的段落还见于鸠摩罗什所译更为流行的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475, 14册, 537a-557b页，但是其中没有使用相同的词语。我很感谢Stephen Teiser帮助我找到这些段落。

<sup>38</sup> 关于宗密的“序”，可以参见《董誥領銜》，阮元、徐松编辑《全唐文》（嘉庆版1000卷，1808-1814年），卷743，7687-2页。

<sup>39</sup> 见韩愈“原道”，《四库全书》版楼昉《崇古文诀》卷7，9a页。

<sup>40</sup> 朱熹《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第88条。

<sup>41</sup> 王阳明《传习录》：“门人薛侃录”卷上，101条，以及“答顾东桥书”卷中，136条。戴震（1724-1777）也曾经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捨”字，但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不再举例了。见张岱年编辑《戴震全书》（安徽，合肥：黄山书社，1994-1995年），卷6，152, 178, 190, 202, 208页。以及John Ewell所译*Re-Inventing the Way: Dai Zhen's "Evidential Commentary on the Meanings of Terms in Menciu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p. 112, 223, 283-284, 334-342, 371. 我也邀请读者们去找一找其他文献中和皇侃的用法相同的案例。

<sup>42</sup> 见钱大昕“赠谈皆平序”，《潜研堂文集》（台北：商业出版社，1968年），卷23，3：335。

<sup>43</sup> 《荻生徂徕全集》（东京：河出书房，1973），卷一。



方法时，曾经捎带提及：“夫子之所谓学者，亦非必捨文字，废见闻焉。”<sup>44</sup>

更早些在 1696 年，浅见綱斋（1652-1711）在他那篇严苛的《语孟字义辨批上》（对伊藤仁斋《语孟字义辨》的批评）中引用东涯的父亲，仁斋的原话“若后世儒者，捨理字，则无可以言者。”仁斋批评宋明理学死抠一个“理”字，而且还把意思弄错了，这一点激怒了浅见。他对仁斋《易经古义》的攻击中，借用太宰春台（1680-1747）对伊藤的批评：“欲舍（同捨）卦爻，而空论义理。”<sup>45</sup>

然而从语文学上讲，以上这些例证没有一个能够与皇侃在六世纪所提出的“捨字制音”和“捨音从字”这两条对用字的解释相提并论。实际上，皇侃所说的“捨”是临时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持有两条原则，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两条选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皇侃的规则是可信的，那么它们就说明当时的训诂学家对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两方面的理解都是空前的，而且表现出一种令人兴奋的语言学上的成熟。<sup>46</sup>

我唯一能找到的与皇侃相互包容的用意相同的例证，在儒医森立之（枳园 1807-1885）用文言文写作的《本草经考注》“叙”中。在这篇作品中，森立之用文献学方法纠正了中、日传统《本草》中很多药名的错误。他叙述他的方法如下：“捨字而取音，捨音而取声……就声而得字，就字而得义。”森立之在叙述他的方法论时，没有提到皇侃“叙”。<sup>47</sup>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各种门类的古典文献中都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例子来印证皇侃的观点呢？甚至在十二世纪晚期或者十三世纪在中国已经失传的《论语义疏》中也没有。而皇侃声称他所总结的原则在他之前的时代被广泛运用。此外，为什么皇侃在六世纪所赞成的方法论仅仅被用来解释《论语》的题目，却从未用在论语的正文中来注释任何文字？如果“三途”确实如皇侃所表示的那样为“先儒后学”所熟悉，那么皇或者其他人会更加广泛地应用这一成熟的文字学以及音韵学方法论的。<sup>48</sup>鉴于这两条重要的异议，我认为皇侃的“叙”不是六世纪的文本。因此，我们必须探讨这一组非同寻常的语言学规则可能是在什么时代浮出水面的。<sup>49</sup>

## 4. 一个解决方案？

Wolfgang Behr 也曾经讨论过中国人在中古时代对语言变化的认知。在一篇近期的论文中，Behr 总结了西汉（公元前 202-公元 220）领土之内的方言差异，这些差异使得语文学和词汇学上的积累已经可用来探讨社会语言学 and 音位学上的变化。Behr 主张这种方言的多样性远在清代考据学者使用文献整理的三大法宝：音韵、文字、训诂之前，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引起了对历史音系变化的关注。Behr 还补充说不太清楚陆法言（约活跃于 600 年前

<sup>44</sup> 伊藤东涯，《绍述先生文集》（京都：文泉堂，1761 年），18.7a（444 页）。

<sup>45</sup> 浅见綱斋，《语孟字义辨批上》，收入《綱斋先生文集》（东京：べりかん社，1987 年），7.137，以及太宰春台《柴芝園稿》“後稿”，10.20a（216 页）。我也邀请其它人到德川和前德川时代的文本中寻找其它例子。

<sup>46</sup> 2007 年 1 月，来自 William Boltz 电子邮件中的信息。John Makeham 的著作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89-91 页中假定皇的语言学规则是真实可靠的。Bryan William Van Norden 所编辑的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一书中的文章则不同意这一观点。

<sup>47</sup> 森立之，《本草经考注》（再版三卷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卷 1，5 页，序 3a 页。这一版本的台湾编辑者在介绍这一本书的时候，对森立之在语言学上的敏感大为赞扬，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到皇侃曾在更早的时候提出这一观点。

<sup>48</sup> 关于皇侃疏中的训诂学方法，可以参见徐望望，《论语义疏语言研究》24-32 页，徐相信皇侃“叙”的真实性（见 61，76-77，131 页），但是他没有提到皇侃“叙”中的文字学和音韵学方法论，而且他也没有在其注疏中找到这一类方法论的应用。

<sup>49</sup> 一位出使明治时代日本的清代士大夫杨守敬（1839-1915），在他的《留真谱初编》（1901 年手稿）中，对日本足利版《论语义疏》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他还是相信这一版本整体的真实性，并驳斥了之前认为根本逊志作伪的说法。杨把足利抄本的写定时代定在两个世纪以前，即 1700 年前后，而怀疑其达不到四、五个世纪之久，即 1400-1500 年左右。

后) 是否有关于语言变化的标准或规范的概念。<sup>50</sup>

Behr 的论证使得皇侃的语言学规则看起来更加不像六世纪时期的观念。Behr 还说不清楚在中古时代是否有明确的对语言变化的历史性认识。为了连接中古时代和帝国晚期之间语言观念的鸿沟, Behr 猜测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音韵学发展的历史。只要读音的变化不是经过了一个特殊过程, 音韵的变化就必须与词汇的范畴综合到一起来考虑。不过 Behr 的发现表明 Boltz 对于这一语言学上的诡辩向中古时代, 尤其皇侃那里进行追踪的途径是正确的。<sup>51</sup>

Behr 还指出, 明代以前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利用语言的变化来裁夺经典中的矛盾解释。显然, 这使得皇侃在 6 世纪显得尤其特殊。不过 Behr 也承认在明代以前的中国, 还“缺乏”理解语言变化的音韵学知识。他总结说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古时代就没有对语言变化的思辨, 但是在这一论点上, 他始终没有提到皇侃的《论语义疏》或者那篇早熟的“叙”。<sup>52</sup>

那么皇侃所提供的富有语言学意味的历史文献学对《论语》用字的解释是否是一个特例呢? 而 Behr 在发表他的关于中古时代中国历史音韵学的观点时, 是否仅仅是因为疏忽才漏掉了这篇“叙”这么重要的证据呢? William Boltz 所提供的这一被 Behr 错过的线索是被错过的吗? 如果我们仅仅诉诸于主观观念的历史, 即幼稚地用这些文本去建立中古时代的评语音学, 那么对以上这些重要问题, 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不幸的是, 对于前现代中国的语音学研究, 有一种主观的看法, 过于相信那些保留至宋代, 随后又在明清时代转变为刻印本的传世文献。这些经典文献经过多次重传抄, 的经典文献抄本再加上从中古时代开始辗转由中国传播到日本和朝鲜, 其中一些又在中国失传, 随后却在海外被发现, 于是问题是就越发地复杂了。由于缺少可信的考古学发现, 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皇侃在中古时代的语言学工作。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较晚的宋明乃至清代的传世本, 或者保留在日本的抄本。日本的抄本或许是个关键。

如果我们要解释是谁同时使用文字学和音韵学清楚地解释了“论语”两字的含义, 就必须回到山井鼎和根本逊志所发现并收入其《论语》的镰仓时代(1185-1333)和室町时代(??)日本的《论语》。因为皇侃的注释和“叙”都在南宋时候失传, 随后在中国无论是抄本还是刻本都没有源头可寻, 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探讨为什么皇侃的音韵学和文字学理论在他的“叙”中都显得如此成熟, 但在他的注疏中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德川时代日本重新发现的皇侃《论语义疏》的所有部分都是真的。作为抄本在日本保留下来的资料并非理所当然具有如其所称的真实性, 而是一个问题: 这一文本是如何成形的, 一个 1750 年来自日本的刻本在成为所有版本中的权威刻本之前, 如何再一次以抄本的形式进入乾隆的四库?

这一篇“叙”作为一系列日本保存的抄本文献之一所告诉我们的, 并不能等同于皇侃穿越若干世纪直接告诉我们的内容。相反, 我们得到的是一部在中古时代的日本成形的、被归功于皇侃的定本, 这一文本实际上是一系列在历史上形成的对皇侃“叙”的理解相互叠加所形成的。这并不是“伪书”。而且皇侃的原本也不是伪书。如果我们仔细关注“叙”中的适用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段落, 会发现这一部分是日本中古时代和近代早期文献学家的再创作, 他们读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原始的“叙”。(Note 舍 or 捨)

要想知道我们在哪里, 一个关键技术主就是皇侃“叙”中所宣称的“舍字制音”和“舍音从字”, 它们通过宁波-长崎的贸易往来重新在中国出现, 仅仅在清代朝廷和南方学者把日

<sup>50</sup> 见 Behr, "Language Change in Premodern China: Notes on its Perception and Impact on the Idea of a 'Constant Way,'" 收入 Helwig Schmidt-Glintzer, Achim Mittag, 以及 Jörn Rüsen 所编辑的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iden: E. J. Brill, 2005), 13-51 页, 特别是 25-29 页。亦可见 Elman, "From Value to Fact," pp. 493-500.

<sup>51</sup> Behr, "Language Change in Premodern China," pp. 29-36.

<sup>52</sup> Behr, "Language Change in Premodern China," pp. 37-42.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本版的《论语义疏》在中国重新出版了以后，这一版本本身是以十八世纪中期室町时代在足利学校发现并重新整理的抄本为底本的。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没有一部日本保存的《论语义疏》抄本可以让我们直接追溯到中古时代的中国。皇侃“叙”中成熟的语言学理论被日本的古文学家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他们在仔细审阅了室町时代的抄本后，认为他们再次接触到了中古时代中国学者对语言变化的认知。

我们很不幸地忽略了《论语义疏》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双线并行”的历史背景，即，既使用日本的“汉文”材料整理并出版，而后又在清代的中国使用传统的中文重新印刷出版。这个关于一部经典和两种经典传统——清代中国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的传说表明谁有可能把原本不存在于皇侃“叙”中的语言学观点加入到最早的日本抄本中。以下，我们将重新审视十八世纪在日本发现的《论语义疏》的多种抄本，以及随后流传到中国的唯一刻本。

## 5. 室町时代的抄本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室町时代的抄本，当时被称为“抄物”，保留到德川时代，徂徕的追随者们是最早一批注意到他们的语言学意义的（见图 1）。究竟哪一份抄本是 16 世纪以后的日本学者所看到并整理的还不清楚。很多这样的日本抄本存在于中古时代的日本（相当于 1200-1500；而“中古时代中国”的时代应当为公元 220-1000）对儒家经典以及四书的注释，这种抄本原本是作为个人在家学习进行的收集，或者是为佛教寺庙和学校的课程准备的讲义。按照 Willem Jan Boot 的说法，这种中国经典的抄本通常还包括日本读物的注释，即“训点”。页边的笔记经常会被当作对某一注解的主要观点的理解或对某些注解的总结纂入正文。<sup>53</sup>

Boot 注意到这些定在 1420 年到十七世纪早期的抄本通常与宋儒有关，并且他还说在镰仓和京都五山寺新出的注释中专门引用了朱熹的经典教材。早期德川时代的儒家学者，比如林罗山（1583-1657）这样在京都建仁寺研修的学者，都会掌握程朱理学，那里是儒僧清原宣贤（1475-1550）收藏经典抄本的地方。后者可以追溯到 1420 年的《东山御文库本》，由清原良兼（死于 1419/1361?）或者是他的父亲清原良枝（c.1350-1431）在为称光皇帝（1412-1428 在位）当侍读时为其准备的教材。这些室町时代的抄本可能依次来自 1242 年由清原教隆（生于 1199）手抄的原始版本，不过现在已经失传了。<sup>54</sup>

（图 1.清原抄示例<sup>55</sup>）

清原家族的后代，包括清原业忠（1409-1467），他的孙子清原宣贤，以及宣贤的孙子清原枝贤（1520-1590）等人，可能是十五和十六世纪《四书》和《论语》最有影响的注疏者。清原宣贤是清原家族的养子，原本是神道教很有影响的祀官吉田兼俱（1435-1511）的儿子，吉田兼俱创立“吉田神道”成为一次有影响力的宗教运动，主要以神道教为基础，但是也吸收了道教、佛教以及儒家的重要元素。吉田家族世代服务于京都重要的吉田和平野神社。作为京都地位高尚的贵族，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清原宣贤和他的儿子也相继担任当时的皇帝后

<sup>53</sup> Willem Jan Boot,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Japan: The Role of Fujiwara Seika and Hayashi Razan* (Leiden: Proefschrift, Rijksuniversiteit, 1982), pp. 6, 54, 238-239n4. 亦可见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选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上、下,分别发表于庆应义塾大学东方研究所:《斯道文库論叢》II (1963): 31-98 页以及 III (1964): 1-90 页。

<sup>54</sup> 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选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上, 52-61 页。很多英文的资料都将清原名字翻译成拉丁化的“Kiyowara”。Boot 在他的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一书 58-59, 70, 83-85 页, 承认朝鲜的儒家在日本的影响, 但是他也强调日本足利-室町时代的禅儒与德川时代地位逐渐提高的正统朱子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亦可见今中寛司,“江戸時代の中國思想”,《季刊日本思想史》4 (1977): 29-43 页, 今中认为林罗山抄袭了清原宣贤的“抄物”。

<sup>55</sup> 见《国宝・重要文化財大全》(13 卷本, 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97-2000 年) 卷 7, 392-393 页。

柏原（1464-1526，1500-1526 在位）和后奈良（1497-1557，1526-1557 在位）的侍读。<sup>56</sup>

某些室町时代晚期的《论语》抄本被称作《论语抄》就与清原家族的注释传统有关，要么是他们对经文注释的复本，要么就是以他们的讲义为基础的笔记。这些《清原抄》体现了整个家族的学术积累。<sup>57</sup>位于大阪南部一个商业港口堺市的成贤家族，在 1533 年重印了曹魏时代何晏的《论语集解》，就是以清原宣贤的原始抄本为底本的，宣贤还为这一版本写了跋语。清原枝贤书写了出版说明。这部书的雕版流传了下来，新的印本出现在早期江户时代。

一些更早版本的何晏的文本和注释也可以早到正平时代（1346-1370）。其中一部在日本出版于 1364 年，而且代表了中国经典在日本的最早刻本。1399 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刻版后，又出现了新的刻版，到十五世纪早期已经有三套不同的刻本。Sugi Takemichi，一位大内宿的家臣，在 1499 年再次重印。Sugi 的版本后来被加上页边注，其中还提到清原宣贤的“家族版本”，并将这一称光时代的版本所包含的内容与清原版本的《论语》进行比较。岛田翰（1879-1915）于 1905 年在他的《古文旧书考》中提到，称光版本可以最终追溯到宋代，不过这一看法已经遭到了质疑。<sup>58</sup>

《清原抄物》也被佛教僧人传抄。镰仓建长寺的僧人笑云清三在 1514 年整理出他自己的《论语抄》，以信镜湖月（死于 1534）在京都东福寺作僧人时候的讲义为基础，湖月的讲义既讲禅学又讲儒学。这两种版本都显示出受到清原的影响，不过它们也都包含一些更早的宋代程朱理学的注释。但这些版本中，无论是抄本还是刻本都不包括皇侃的《论语注疏》，除非笑云和信镜把皇侃注都包括到他们所谓的“古注”中了。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皇侃“叙”的最早版本当时收藏在京都的佛孝寺院曼殊院。<sup>59</sup>

不过皇侃的《论语注疏》还是有一部清原抄本保存在了京都大学的善本书收藏部，是由清原良兼（1575-1614）抄录的。不幸地是，第一卷遗失了，因此那篇皇侃“叙”即使存在，也不在这部抄本中了。后来印刷的版本都晚于元和（1615-1623）和宽永（1624-1628）时代，而且它们可能是以清原秀忠的讲义为底本的。这些抄物中的大多数都是关于何晏的《论语集解》的，但有时也会引用《论语义疏》，不过没有引用过皇侃的“叙”。而且我们还知道另一部四书中的抄本《中庸抄物》，是 1493 年在足利学校抄写的。<sup>60</sup>

Boot 和其他人已经指出只有两三种传世的“论语抄物”真正与足利学校有关。Boot 认为它们可能是非常接近清原抄的较晚辑本。不过山井鼎和根本逊志都自称他们在足利学校发现了抄本，使得他们能够整理出《论语义疏》的新版本，这一新版本就包含了皇侃的“叙”。<sup>61</sup>

三十五种版本《论语义疏》中的绝大多数被影山辉国定为室町时代晚期，还有一部分可以上溯到十五世纪。按影山的说法，最早的版本相传可以追溯到 1427 年，收录于东京的《尊经阁文库》。不过影山已经发现这些《论语义疏》的抄本中只有二十种（=57%）包含皇侃的

<sup>56</sup> 见 Allan G. Grapard, “The Shinto of Yoshida Kanetomo,” *Monumenta Nipponica* 47, 1 (Spring 1992): 27-58. 关于清原的《论语抄》，见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选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上，52-98 页，以及“下”1-4 页。

<sup>57</sup>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pp. 388-390. 关于清原的《论语抄》，见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选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上，52-98 页，以及“下”1-4 页。

<sup>58</sup> 川瀬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 年），61, 274-278 页。亦可见川瀬《日本書誌学之研究》（东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昭和，1943 年），1664-1689 页。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123, 以及武内義雄，《论语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2 年），436-467 页。这些版本中的一部分收藏于现在的东京大学东方图书馆，见网页：<http://asi.ioc.u-tokyo.ac.jp/eng/html/ess017.html>。

<sup>59</sup> 关于笑云清三，见足利衍述，《鎌仓室町时代之儒教》（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32 年），433 页，关于信镜湖月，见 456 页。

<sup>60</sup> Boot,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Japan*, pp. 57-59. 见网页：

<http://edb.kulib.kvoto-u.ac.jp/exhibit/tenjikai/doc/tjtx079.htm> 上清原良兼所传的《论语义疏》。

<sup>61</sup> Boot, p. 59, 240-241n37. 一些学者将足利抄本的《论语义疏》定于 1521-1524 年，而另一些则将其定在德川时代早期。

“叙”。另外十五种(=43%)则没有皇侃的“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京都大学所藏 1550 年的清原抄本遗失了第一卷，而那里有可能包含这篇“叙”。其它十四种则很明白地没有，或者像我们在足利版本中看到的那样，只有这篇所谓“叙”的一小部分，这些内容后来都加入到了原始抄本第一页的眉批和夹批中（见图 6A 下部）。<sup>62</sup>

最早接触这些抄本的学者都是儒家学者。18 世纪 20 年代，德川时代的文献学家日益赞同伊藤仁斋——一位京都商人的长子——所引领的“古学”思潮。仁斋试图复原他所认为的孔子学说的真实面貌，尤其是《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仁斋的儿子——著名的伊藤东涯曾经写道“吾先人常尊《论语》，以为宇宙之至宝”。仁斋和他的儿子两人都反对朱熹和其他宋儒所主张《大学》是孔子单独创作的说法。<sup>63</sup>

相似地，十八世纪德川时代被获生徂徕称之为“古文辞学”的思潮也要求用文本材料提供证据，以挑战南宋末期的宋儒，仁斋和徂徕认为朱熹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是“空洞的学说”。镰仓时代的禅学大师和室町时代清原家族的追随者们是最早把朱熹的学说奉为圭臬的人，并为十七和十八世纪德川时代学术圈中的林罗山等人所追随。

仁斋的追随者们强调将经典读本和《论语》进行对比，徂徕的学生则走得更远，他们甚至要重构儒家经典的面貌。这一努力依赖于找到日本可以上溯到最早从中国引进的最可信的抄本。太宰春台也认为这一研究是徂徕得以超越仁斋的有利因素：“近世的大师仁斋先生虽然对孔子足够尊重，却不了解孔子之道即保存在六经中的先王之道。”这就是为什么皇侃的抄本一经被发现就立即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日本学界的领先地位与在中日文献学界的领先地位是相重合的。<sup>64</sup>

## 6. 皇侃注的乾隆和德川版本

乾隆的四库馆臣在 1781 年写的“提要”中称从杭州进献来的日本版的皇侃注与他们已有的一些《论语》版本内容相同。其中一个版本就是余萧客（1729-1777）从其他中国文献中辑出来的。另外一个来自钱曾（1629-1701），他因为不认识日本版何晏《论语集解》上的日本年号，因此将其错定为朝鲜的版本。四库馆臣也认为钱的朝鲜抄本源自中古时代的中国。实际上那是 1364 年正平时代来自日本的清原抄的副本，被明代中国的一位海军将领带回中国，他于 1591 年在朝鲜与日本作战时购买。<sup>65</sup>

四库馆臣认为日本的版本对于中国学者“尤可以旁资考证也”，因为它优于质量不稳定的“明刻监本”。不过他们也指出日本学者所列举的一些出现在何晏《论语集解》中的注释者的名单“不可据者有之”。中国学者对这一版本的接受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是就不那么公正了。四库馆臣从未提到根本逊志在日本版本的整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只知道这一版本来自足利学校，即 1732 年山井鼎和获生北溪曾经用来编辑《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地方。到 18 世纪 80 年代，足利学校作为一处中国古代文献的贮藏库在中国已经名声远扬。徂徕学派的学者们乐于接受这种认识，因此也没有纠正中国学者的这种观念，而中国学者也并不知道在日本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献贮藏库。<sup>66</sup>

<sup>62</sup> 影山辉国“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皇侃自序”，53-56 页。

<sup>63</sup> 伊藤东涯，《绍述先生文集》，19.9a, 20.12a-15a 页。亦可见 Joseph J. Spae, *Itō Jinsai, A Philosopher, Educator and Sinologist of the Tokugawa Period* (Peiping: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XXI,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48), Appendix I, "Discussion Proving that the Great Learning is not an Authentic Work of Confucius," pp. 221-231.

<sup>64</sup> 服部南郭：《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1a 页，以及太宰春台《春台先生柴芝园稿》“后稿”10.10b（211 页）。

<sup>65</sup> 《四库全书》为皇侃《论语集解》所做“提要”，35.2b-3a 页（经部八）。亦可见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pp. 388-389n10. 藤塚鄰的《日鲜清の文化交流》28 页，认为这篇“提要”是戴震所作。

<sup>66</sup> Führer,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and the Commentaries Deviates Greatly from Current Editions," pp. 24-25.

## 日本版的《论语义疏》在中国

根本逊志 1750 年版的皇侃注疏于 1788 年在中国重印出版，收入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当时名为《论语集解义疏》。而且，其中没有收录服部南郭写于 1750 写年的“叙”。日本版和中国版包括相同的版式，也即相同的页数，每页九栏，每栏二十字。《论语义疏》的首页为刻工留出了作者和编者的空当，但是中国的编者没有提到根本逊志作为皇侃“叙”（见图 2 及图 3A）和注疏的编者身份。中国版“叙”的第一栏写了书名，第二栏只写了皇侃的名字和朝代。

（图 2.《知不足斋丛书》本皇侃“叙”）

此外，清代考据学家卢文绍 1788 年在为《知不足斋丛书》版《论语义疏》作“序”的时候，还只知道这一新印的皇侃疏来自日本的足利学校，而且与更早钱曾发现的所谓“朝鲜”本何晏的集解相一致。与这一误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卢在他更早时候为分别于 1776 年和 1781 年为来自日本的太宰春台整理的《孝经》和山井鼎整理的《七经》写序时，都有所认识。有趣的是，为根本逊志的版本所作的“叙”又传到了日本，并且在 1795 年根本逊志的作品重印时被收录了。在更晚的 1864 年的版本中又一次被收录。虽然卢文绍没有提到根本逊志是整理者，但是他自身的名气使得他对日本整理本的赞扬在日本仍然为根本逊志的工作带来了荣誉，就像卢在更早为太宰和山井的整理本作序时所产生的影响一样。<sup>67</sup>

（图 3A. 四库本皇侃“叙”的首页）

在皇侃注本的开头页，根本逊志版本的第一行是《论语》的第一章；第二行是《论语集解》的编辑者何晏的名字（还有他所属的朝代“魏”）；第三栏是《论语义疏》的编者皇侃的名字和他所属的朝代“梁”。根本逊志版本的“叙”从右边数第三栏（见图 3B），以及注解本第四栏（见图 4A）是根本逊志的名字和他所属的日本国籍。他的身份是“校正”。

（图 3B. 根本逊志版的皇侃“叙”）

然而中国的版本仅仅把文本的开头往右挪了一栏就掩盖了根本逊志的工作。实际上，无论是以王亶望刊行于 1774 年前后的版本为底本的鲍廷博版本，还是四库本，都像四库馆臣的“提要”一样，抹去了根本逊志在皇侃注本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为了让自己获得承认，王亶望在他 1775 年所刊刻的巾箱本中，已经用他自己的名字代替了编辑者根本逊志的名字（见图 4B）。<sup>68</sup>

（图 4A. 皇侃“义疏”的根本逊志版本）

（图 4B. 皇侃“义疏”的王亶望版本）

中国版本的所有其他部分看起来都和日本的版本一样，但是 Bernhard Führer 发现了《论语》中一个有关夷夏关系的重要段落落在《知不足斋丛书》以及进献到四库的版本中都被改动了。这个有问题的段落在《论语》第三章第五节，从汉代到宋代的注家都认为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图 5 中根本逊志的版本显示皇侃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

<sup>67</sup> 见卢文绍“皇侃論語義疏序”，1a-2a 页，收入根本逊志《论语义疏》（1864 年版）。卢为山井鼎和太宰春台的作品所作的“十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收入其《抱經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86-87 页，以及卢的“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20-22 页。不过卢看不懂日本的年号，所以错误地把山井鼎在日本做整理的 1720 年弄成了 1666 年。

<sup>68</sup> Bernhard Führer 的“‘The Text of the Classic,’” 27-28 页提到根本逊志的名字奇迹般地保存在了严灵峰《无求斋论语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 年，2.4b-5a 页）所收《知不足斋丛书》版《论语义疏》的影印本中。



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这一解释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是被普遍接受的，不过正如 Kate Nakai 所指出的，当时有一些文献学家认为满人统治下的中国人比未间断血缘的皇族治下的日本人更加蛮夷。但是根本逊志像他的老师徂徕一样，并没有对这一文献上的颠覆性表示赞同，尽管徂徕和其他人都认为中国不同于日本，的确是在衰落。<sup>69</sup>

然而鲍廷博所刊刻，后来收入四库的中国版本（见图 5B）中，皇侃对这段文字的注解被颠倒了，可能是以王宣望的第一版为底本的。Führer 推测是王把原来的内容改为：“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王在这里接受的是以程朱理学为首的宋儒的注释，相信孔子所批评的是周代（公元前 1045-公元前 221）中期，孔子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混乱状态。在他的修改版中，皇侃似乎是在说夷狄要更好一些，因为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有个统一的君主，而周朝则处于乱臣贼子的混乱当中。

（图 5A. 1750 年根本逊志版《论语义疏》中有关夷狄的段落。）

（图 5B. 四库本王宣望版中有关夷狄的段落。）

（图 5C. 朱熹《论语集注》中有关夷狄的段落。）

朱熹在他十二世纪的作品中，已经对此注解表示赞同（见图 5C）。按照朱熹的说法，孔子认为夷狄不像当时中国，即周王朝那样僭乱，因为他们仍然保留了统治者。这一宋代的注解直接进入了四库本中被称为可以上溯至六世纪南朝梁的皇侃注中。<sup>70</sup>宋代的这一注解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王宣望为什么要玩这样的把戏，借用皇侃在中古时代的注疏来阐明宋儒的观点呢？

Führer 的解释是能够使人信服的。作为当时清政府治下的一名汉族官僚，“王已经意识到满人对于文献中贬低非汉人的文字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预先做了一些‘调整’。”另外一个不太可能的解释，认为是四库馆臣自己做的修改，就像他们对很多其他书所做的那样。这一假设不太可信是因为 1787 年武英殿本的皇侃注疏恢复了皇侃原来的注解，完整保存了那段对夷狄的贬低。<sup>71</sup>

Führer 责备清代文献学家滥用了根本逊志的版本。十八世纪晚期又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可信的，而另一种部分地被王宣望或四库馆臣审查修改过的。改过的版本被收入四库，而另一个则最终出版了殿本。Führer 还主张如果我们能够假设根本逊志版的皇侃疏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将得出可靠的结论，即流传到日本的抄本展示了一个清楚的版本源流。”这一假设表明对于 Führer 来讲，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好地“保护”了儒家经典。毕竟，《论语义疏》已经在中国失传，却得以在日本保存下来。而且，当它在日本被再次发现以后，也没有像在乾隆时代的中国那样，被改动过。<sup>72</sup>

我在 2006 年六月拜访了足利学校，目的是去看看《论语义疏》皇侃“叙”的抄本，**即就是**根本逊志所整理的底本。在足利学校，我在抄本的前面寻找皇侃的“叙”，却徒劳**无益无功**。即使翻遍了整个皇侃注疏的十卷本，也**仍然**没有找到那篇“叙”。幸运的是，足利学校为他们最珍贵的善本书，也**包括**这部皇侃抄本的开头页做了摹写本，是一个还不错的复制品（见图 6A）。2006 年秋天，我在普林斯顿的研讨课上以这个摹本为基础，和我的学生们仔细研究了这上面的内容，试图寻找皇侃“叙”的线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开这一谜团的门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sup>69</sup> D. C. Lau, *Confucius: The Analect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9), p. 67. 见根本逊志 1750 年版《论语义疏》2.4a-4b 页，对比 Kate Nakai,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Japan: The Problem of Sinocentr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1 (1980): 178-179.

<sup>70</sup> 见《四库全书》版的《论语义疏》，2.4b-5a 页，亦可见朱熹的《論語集注》，2.2b 页，《论语集成》版（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 年）。对比 Führer 的“The Text of the Classic,” 26 页。

<sup>71</sup> Führer,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pp. 30-33. 关于朱熹对汉魏六朝古注的破坏，可参见王槻信良的“論語集注における皇疏参酌の態度”，《東方學》59 (1980): 89-95 页，他从朱熹的注解中找到 113 条来自属于刑昺 (932-1010)《論語注疏》，452 条来自何晏，以及 67 条来自皇侃的注疏，不过朱熹的这些注解很多可能有其他来源。

<sup>72</sup> Führer,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pp. 37-38.



径。<sup>73</sup>

## 足利抄本《论语义疏》之谜

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逊志，以及服部南郭在介绍他们所整理的儒家经典的来源时，都只提到是他们在足利学校发现的抄本。从前面第 5 部分所讨论的内容可知，在日本还有很多其他收藏传入日本的经典抄本的地方。那些收藏在佛教寺院的藏本可以上溯到中古时代的清原抄本，而且可能只有僧人可以接触到。徂徕学派的学者们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只能去发掘足利学校的收藏，这也使得山井鼎和根本逊志可以对于日本和中国《论语》版本的确认作出特别重要的贡献。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从图 6A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皇侃的“叙”并没有以“序言”的形式出现在根本逊志所使用的足利学校的抄本中。影山辉国在 2006 年整理一个新版本的皇侃“叙”时，提出了这个谜团，他是从三十五个版本中有这篇“叙”言的那二十种（=57%）《论语义疏》为底本的。影山还补充说看起来不会是足利抄本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皇侃的“叙”，因为现存的页码标记是从头到尾连续不断的，意即什么都没有丢失，而且因为开头的皇侃注疏都是用小字体，所以也根本没有“叙”的空间。影山注意到，皇侃“叙”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用小字体夹在这一抄本的首页中。影山提出的“谜”是：为什么根本逊志没有表示足利版本的《论语义疏》是缺少皇侃“叙”的？<sup>74</sup>

实际上这个谜还要更加复杂一些。如果皇侃的“叙”是我们在本文第 4 和第 5 部分所罗列的那些珍贵的文字学和音韵学成就的唯一出处，如果根本逊志用来整理那篇“叙”的足利抄本压根就没有一篇“叙”，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为什么根本逊志没有坦承足利抄本不存在那篇“叙”，而且还要追究根本逊志版的那篇“叙”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一点上，影山和他在日本的前辈，比如武内义雄，都简单地假定根本逊志一定是从其他版本中辑来的这篇“叙”。他们没有考虑我在前面提出过的其他可能，即使根本逊志依靠的是其他版本中的“叙”，那么这篇“叙”本身可能也包含有后代蹿入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理论。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图 6A. 足利版《论语义疏》首页。）

不过对足利抄本更深入的研读会显示，在抄本的前言页中的确有四个部分包含有根本逊志所称皇侃“叙”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后人在原抄本上写的眉批和夹批。我把这四个部分用红色的罗马数字（I-IV）在图 6B 中标出，而文本内容则用黄色标出。编号 II 的部分是字迹比较潦草的眉批，编号 III 夹在《论语义疏》总标题和章节题目之间，这两部分以文字学和音韵学来解释“论语”之所以称为“论语”的内容也都出现在皇侃“叙”中，两者的段落或句子几乎完全相同。<sup>75</sup>

（图 6B. 足利抄本《论语义疏》开头所加入的内容。）

下面是足利抄本眉批，即第 II 部分的八行文字（见图 6C）（用普通字体），和根本逊志所整理的皇侃“叙”中相同内容文字（用黑体字）的对比。我把相异的文字涂灰。

第一行：倫 次也， 理也， 綸也， 輪也。論 此書門  
倫者次也…倫者理也…倫者綸也…倫者輪也…論者，言此書  
第二行： 徒 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 記

<sup>73</sup> 见長澤規矩也，《足利學校善本圖錄》（东京：汲古书院，1973 年），46 页。

<sup>74</sup> 影山辉国，“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皇侃自序” 57-59 页。

<sup>75</sup> 第 I 和第 IV 部分中包含的是皇侃“叙”中其他的内容，因此本文不作讨论。这两个部分可能和第 II 以及第 III 部分是同时写入的，笔迹也相同。

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  
 第三行：則必先論，故曰論也。倫論無異 蓋  
 記必已論，故曰論也…倫論無異者，蓋  
 第四行：是南楚北夏音殊 耳 南人呼倫  
 是楚夏 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為論事  
 第五行：北人呼論 音字雖異 而義趣 一也  
 北土呼論事為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  
 第六行：侃云 從音依字，二途 會為一義 作論  
 侃案…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  
 第七行：者明此書門徒詳論 而？音？作倫者 此書 含  
 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而 音 作倫者，明此書義含  
 第八行：妙理經綸古今 首 末 輪環  
 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

从第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足利抄本对于《论语》书名中的“论”字以字音为基础的四种训释（次、理、纶、轮）更加简明扼要。往下，我们还可以在第三行到第五行中发现，足利抄本提出中国的南北方用不同写法的“伦/论”来表示相同的含义。最后，在第六行标记为灰色的部分“侃云：从音依字，二途会为义作‘论’”，是说两种原则共同作用，显示出“论”字的意义。

（图 6C. 足利抄本首页的第 II 部分。）

足利抄本的资料上，皇侃语言学方法的重要观点基本上都有了，只是顺序上有问题。在根本逊志版的皇侃“叙”中，先讲的是音韵学，后讲的文字学，而读音的地域差异最后才讲。仅从一份足利抄本中，根本逊志不太可能知道顺序是需要改变的。最后，这一附加在足利抄本后面的文本并不能充分解释皇侃“叙”是如何读的。谁写的第 I 部分呢，这与谁写的皇侃“叙”的开头一样也成为了一个谜。有没有可能是根本逊志自己呢？

（图 6D. 足利抄本首页的第 III 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第 III 部分，图 6D 中用黄色标出的小字内容夹在书名和章节名两行大字之间。下面又是一组两段文字的对比，足利抄本夹批第 III 部分的文字用普通字体，而根本逊志所整理的皇侃“叙”中的内容用黑体字。

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為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  
 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為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sup>76</sup>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版本。这一行夹批表明某人在其他本子中看到这一内容，并记住，或者抄录到了这里。我们要再一次询问，这个人是根本逊志吗？很显然是某个看到过其他本子的人。

如果我们再次审阅一下足利抄本首页的眉批（见图 6A 和 6B），会看到这段眉批的左边，第 II 部分的后面提到了南宋和邢昺（932-1010）。看起来第 I 到第 IV 部分的内容在日本被记录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一段时间的开始一定在 1126 年北宋王朝灭亡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文献的标记和转录都使用了不同的书法。但是抛开后来增加的第 I 到第 IV 部分内容，仅仅看单纯的足利抄本，并将它与其他《论语义疏》的本子进行比较，似乎只能将其追溯到室町时代晚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批注就加入得更晚，甚至有可能就是根本

<sup>76</sup> 我对 Makeham 的部分译文上做了一些修改。（作者所指修改在其英文原稿上，中文稿使用的原文，不存在修改问题，译稿为保持原样，将此注解保留。——译者）

逊志自己的手笔。即使足利抄本本身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比如 1242 或 1420 年（见前文）清原抄的可信版本的复本，第 I 到第 IV 部分还是足利抄本的独特之处，而且也有可能来自另外某个清原抄本。第 II 和第 III 部分的作者不管是不是根本逊志，都应该看到了其他版本的皇侃“叙”，并将其加入到了足利抄本中。

要想在现存的证据中找到皇侃“叙”的较早抄本，即足利抄本上所见的第 II 和第 III 部分内容的出处，是没什么可能了。另外，在传世的二十个包含皇侃“叙”的《论语义疏》抄本中，可能永远也无法整理出一个像武内义雄、高桥均和影山辉国所找到的那么接近的版本了。除了这些日本的抄本，我们也无法在中国找到任何一个早于根本逊志的整理本的皇侃“叙”。像皇侃这样一位中国中古时代的资深“玄学”家，有没有可能在当时从音韵学、文字学以及地域差异的角度，写出这样三条关于《论语》用字的语言学规则呢？**这一后加的“叙”有可能在日本出现，随后在大多数而非全部版本的“叙”言传抄过程中被逐渐规范。**<sup>77</sup>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所谓的皇侃“叙”在日本的可能来源是哪里呢？根本逊志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皇侃“叙”其他可用的版本中哪个是最老的。即使他知道，他也未必见到过。我们也是到这个时候才能明白，为什么他如此这么过多地强调足利抄本的权威性，即便虽然足利抄本缺少皇侃“叙”。他很可能依靠其他的版本把他这一非同寻常的整理工作补充完整。我们能否追踪到根本逊志所没有提到的版本，并由此上溯到皇侃呢？

## 7. 寻找日本的原始抄本

在中国的正史记载中，皇侃的传记在《南史》（南朝 420-589）和《梁书》（南朝梁 502-557）的“儒林传”中都有出现。皇侃于公元 546 年，58 岁的时候去世，时值隋代，他当时是好几种经典文献的最早注疏者。正史的皇侃传中提到他专攻《礼记》、《孝经》和《论语》。传记中还提到他的重要著作有十卷《礼记义》和《论语义》。这些作品都是“义疏”，即对经典**注解**的注解，这种形式在汉代和三国时期（220-280）出现。<sup>78</sup>

《隋书·经籍志》是由唐代学者编辑的，收录皇侃作品的题目为《论语义疏》，使得它更加符合官方注疏的体例。有意思的是，宋代刘昫（887-946）所编辑的《旧唐书》（唐代 618-907）将皇侃的作品定名为《论语疏》。<sup>79</sup>

在唐代早期，朝廷为结束几个世纪以来南北学术分立的局面，曾致力于为五经定出一套规范的注解。于是在七世纪 40 年代，**唐朝政府支持了**由孔颖达（574-648）领导编辑的《五经正义》**获得了唐朝政府的支持**。通过这一计划，曾经各自独立成书的注和疏在《正义》中都被分割开来，并对应到它们所注解的经文之后。<sup>80</sup>

**注疏发展的高峰是北宋邢昺的十三经注疏，将这一方式扩展到了五经之外，他的前人，比如皇侃所疏的《论语》也收入到了邢的汇编本当中**（见图 7）。到南宋时代（即《论语义疏》失传的时代），很多注和疏都丧失了它们独立成书时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内容被用来作为新的省级和中央两级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sup>81</sup>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sup>77</sup> 关于皇侃与“玄学”之关系，可参见 Robert Ashmore, “Word and Gesture: On Xuan-school Hermeneutics of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4, 4, (October 2004): 458-488.

<sup>78</sup> 见姚思廉所编《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62.1507-1508 页，以及李延寿等所编《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48.672, 680-681 页。

<sup>79</sup> 魏徵等所编《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32.920, 922 页。亦可见刘昫所编《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46.1973 页。对比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pp. 80-85.

<sup>80</sup> 关于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可见申屠炉明，《孔颖达，颜师古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23-39 页。

<sup>81</sup> 内藤干治，“皇侃論語義疏の由來及其影響”，收入王勇编辑《中日漢籍交流史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250 页，这篇文章提到了邢注的流传与皇疏的亡佚。

皇侃的作品在这个时代被拆开收入到了十三经注疏当中。皇侃的作品在平安时代（794-1185）早期到达来到日本，经常以《论语义疏》之为名被引用，但情况也不总是这样，我们将在下面将会看到。似乎皇侃的注疏本早在 10 世纪以前曾以独立成书的单行本形式传入日本，但是它在唐代和宋代的注本中被拆开剪贴，再由邢昺重新组合的本子后来也传入了日本。<sup>82</sup>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图 7. 邢昺整理本《论语注疏》中关于夷狄的段落。）

日本（或全世界）现存最早皇侃“叙”的版本之一是一部看似与皇侃的《论语义疏》毫无关系的《论语》。其“汉文”标题为《论语总略》，现存于京都的曼殊院，被指为镰仓时代的抄本（见图 8）。勤勉的武内义雄是第一个引用此抄本的学者，他用来整理和校对根本逊志 1750/1864 年版本的皇侃“叙”。在这一整理过程中，武内义雄得出的结论，与基于室町时代晚期抄本的其他版本不同，即《论语总略》抄本可能来自镰仓时代皇侃《论语义疏》的某一版本。<sup>83</sup>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按照武内义雄的说法，《总略》比足利抄本和其他根本逊志所用的室町时代的版本都要好。正如其题目所显示的，《总略》是一部综合作品，以一种文摘的形式，把皇侃“叙”的大部分内容都收录了，只是拆分到不同的部分，同时还有来自宋代程颐为《论语》所写的笔记中的内容，这些内容曾经被朱熹收入到《论语集注》中。曼殊院和武内义雄为抄本所定的时代是介于十二世纪晚期与到十四世纪早期，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南宋（即《论语义疏》失传的时代），到元代（1280-1368）晚期之间。<sup>84</sup>

（图 8. 曼殊院《论语总略》抄本的卷首卷尾页。）

武内义雄认为《总略》版的皇侃“叙”虽然不完整，但是以镰仓时代抄本的皇侃叙和疏为底本，所以他相信《总略》来自中古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版《论语义疏》。由于因为曼殊院的山口圆道师于 2007 年 8 月去世了，2007 年秋天我没有能够获准亲验寺中所藏的这一抄本。幸运地是，高桥均曾经看到过这一抄本，并且写了好几篇关于《论语总略》的论文，其中两篇近期发表了。影山辉国没有把《总略》收入他所列举的三十五种版本的《论语义疏》，可能这是因为影山辉国认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版本，或者因为它包含其他的外来资料。<sup>85</sup>

## 《论语总略》的形式和内容

关于《总略》抄本，首要注意的是尽管很难读，但是它包含了根本逊志所整理的“叙”中那段成熟的语言学观点的完整内容，而足利抄本的眉批中则只有一个删节版。为什么更晚的足利抄本比起相传较早了两或三个世纪的抄本，会更加不完全呢？不过在我们更深入地讨论这些语言学内容之前，先要把目光转向《总略》的来源，并考虑一下为什么其中的语言学内容被称为“王侃叙”而非“皇侃叙”。<sup>86</sup>

图 8 中的抄本是用潦草的行书和草书抄写的，这种抄本往往是抄写人在已经有一个本子

<sup>82</sup> 关于邢昺，见 John Kieschnick, “Analects 12.1 and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2, 4 (Oct. - Dec., 1992): 569-573.

<sup>83</sup> 图 8 发表于《国宝·重要文化財 大全》卷 7, 336 页。

<sup>84</sup> 武内義雄, “國寶論語總略について”《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1 (1952): 1-13 页。阿部隆一, “室町以前邦人選述論語孟子注釋書考”上 40-42 页, 将“宋学”影响下的“总略”定于镰仓时代晚期, 他推测这一宋学因素的加入可能来自广东学者李用, 他于 1278 年前后在文天祥 (1236-1283) 领导南宋军队抵抗元军失败之时逃到日本。李曾经写了一本继承二程理学的《论语解》。

<sup>85</sup> “总略”本身是一部没有页码的卷轴本, 关于其物理形态, 可参见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選述論語孟子注釋書考”上, 37 页。我在下文中的观点主要基于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 《大妻女子大学紀要》33 (2001): 151-164 页, 以及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二)”, 《大妻女子大学紀要》35 (2003): 177-189 页。

<sup>86</sup> 见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 152, 154-155 页。南宋时期晁公武 (1105-1180)《郡齋讀書志》错把皇侃写成了“王侃”。

的情况下要快速抄写一个文本。也就是说，《总略》的版本不是用来代替原书的；这些从原始底本中快速抄录的内容是为日本的读者，主要是和尚服务，他们有阅读行书和草书的能力。那些只能阅读“楷书”的人大概只能辨认出其中一些比较清晰的文字，而不是全部，比如我就是这样，不得不借用其他更可读的版本来解读这一抄本。而且，注意到抄写者在竖栏中加入了“训点”的批注来为那些只能阅读“日语中文（汉文）”的读者导读。如果《总略》抄本是镰仓时代（相当于北宋）以更早的《论语义疏》为底本的抄本的话，那这些导读的批注可能就是在后来的室町时代（相当于明代）加入的。也有可能，它们泄露了《总略》并非镰仓时代抄本，而是室町时代晚期抄本真相。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图 8（卷首）从右数第三栏的顶部，就是在这里，《总略》中的“皇侃”就被改成“王侃”，这两个同音字的混淆很奇怪但并非不常见，这有可能来自梶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中错把皇侃写成了“王”侃。我们应该记得乾隆的四库馆臣在 18 世纪 80 年代收录日本版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时，也曾为其中记载的那些早期注疏者奇怪的名字感到棘手。这就表明日本人在写中国名字的时候，偶而会用一个相同韵母的字来代替正字，比如用“王”来代替“皇”。

还有，在第三栏的顶部（图 8）提到的是“王侃疏”而非《论语义疏》。那段解释为什么叫《论语》的语言学材料也被冠以另外的题目，即“题名”。因为这里的“王侃疏”没有被叫作《论语义疏》，这一措词表明《总略》的编者（们）面前所使用的文本是来自“王侃疏”，而非直接来自《论语义疏》的“叙”。它们的来源可能是某个经典注疏本中已经被分割剪贴并被简单地称为“王侃疏”的《论语义疏》。这种集注本的特点就是把所有注解集中到原典相应的每一段落之下。

还有其它地方，在曼殊院抄本的第一页（见图 8），编辑者的确把“叙”放到了前头。但是被称为“王侃疏叙”。其文字内容与根本逊志版的“论语义疏叙”有很大的不同。根本逊志所使用的标题是基于他所发现的一个或多个抄本，都不是《总略》。<sup>87</sup>

《总略》第三页出现的“题名”部分是跟随前面部分的，见于图 8，名为“大纲”。在这里编者从皇侃义疏“叙”而不是《论语义疏》的第一部分抄录了三个小节，又从程颐所作的《论语》笔记中抄录了五个段落。在《总略》的第二部分，“题名”部分之后探讨“本之同异”。这一部分介绍了汉代三种《论语》本子的差异，即“古论”、“齐论”和“鲁论”。这一部分的开头是另外一段来自“王侃疏”的引文，说明最古老的《论语》版本已经在秦朝“焚书”的时候被禁止了。因此，在原始版本的《论语》失传以后，多种不同的写本出现，重新形成了这三种版本。那些后来在《论语义疏》中被称为“皇侃叙”的重要内容，在《总略》中只是被称为“皇侃疏”。<sup>88</sup>

《总略》的第四部分交待了“注者姓名”，而第五部分则列出了“二十篇目录并篇次大意”。在第五部分，《总略》的编者仍然使用皇侃为《论语》所作的疏，但是他们不称《论语义疏》，而是使用其他名称。还有，《总略》中的篇次大意也与皇侃所做《论语义疏》的其他版本相似，但仍然不说这个书名。<sup>89</sup>

高桥均的重要发现在于，《总略》与晚期室町时代版本皇侃《论语义疏》的篇次大意有些细微，却很重要的差异。高桥均还补充说，如果《总略》确实是以某个镰仓时代的《论语义疏》作为底本的话，那么也应该能够在《总略》和室町时代其他版本的《论语》之间找到相同的差异。但是没有人能够找到，这表明《总略》的编辑者自行修改了他们所使用的皇侃疏。

<sup>87</sup> 影山辉国“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皇侃自序”，57-59 页。亦可见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152-156 页。

<sup>88</sup> 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156-157 页，讨论了这第三部分。

<sup>89</sup> 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二)” 187-188 页，以及高桥的“論語義疏皇侃序札記” 1-14 页。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高桥均认为武内义雄提出的《总略》是以镰仓时代《论语义疏》为底本的说法是可疑的。当《总略》的编辑者抄录王/皇侃的注疏时，他们进行了修改。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总略》并不是以镰仓时代，或日本更早的《论语》祖本为底本的。更进一步，我还要进一步认为《总略》所本的《论语义疏》可能并非独立成书的本子，而是集注本，其中已经写成了“王侃疏”和“王侃疏序”。<sup>90</sup>

## 《总略》以及《论语义疏》“王侃”“叙”的问题

高桥均发现的关于《总略》抄本和室町时代皇侃注疏本之间在篇次大意上的差异，有利于弄清楚《总略》作为一种非独立的论语摘抄的性质。高桥均的结论也告诉我们，不要把《总略》的来源当成镰仓时代的原始版本。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总略》版的“王侃叙”和根本逊志版“皇侃叙”之间的关系了。下面我就使用了武内义雄和高桥均版《总略》“王侃叙”中的语言学部分，和1750年根本逊志出版的“皇侃叙”进行比对，其中王侃叙在下用普通字体，皇侃叙在上用**黑体字**。文字不同的地方用灰色标出<sup>91</sup>

論語義疏叙…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  
王侃疏，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

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削音，呼之為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倫論二稱義無異也。  
大判有三說，第一捨字從音，呼之為倫，第二捨音從字，而號曰論，第三倫論二稱義無異也。

第一捨字從音為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  
第一捨字從音為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

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  
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

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  
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

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  
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

第二捨音依字為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  
第二捨音依字為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

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  
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倫論二稱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

与《总略》的篇次大意和“王侃疏”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是，《总略》版王侃的语言学观

<sup>90</sup> 见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157-163页，以及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二)”177-188页。

<sup>91</sup> 见武内义雄的抄本“國寶論語總略について”5-6页，以及高桥均，“論語總略について(一)”154-155页。我很感谢高桥教授对这一问题所写的导论“論語義疏皇侃序札記”4-7页。



点与根本逊志版皇侃的观点有特别的重合。根据以上《总略》的摘要与皇侃疏的区别，为什么这两个版本的三个语言学论点，除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区别，都几乎完全一样，只除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区别？似乎看来，是如果《总略》的编者修改了皇侃“叙”以适应其需要，那么他们也应该有可能在其中增加了内容，比如说在“叙”中。

上文没有进行对比的《总略》“疏叙”的其他部分，也与根本逊志的版本基本一致。而且，除去很小的区别，《总略》和根本逊志的版本也与影年山辉国在 2006 所整理的其他二十个包括“叙”的抄本相一致。这似乎表明《总略》所添加进皇侃“叙”的内容在后来成为标准，并被室町时代《论语义疏》抄本的皇侃“叙”所收录。于是碰巧地，《总略》虽然不是今真正的原始版本，却被根本逊志一系直接的前辈学者和武内义雄当成了原始版本来使用，即使虽然根本逊志本人并不承认这点。毕竟《总略》的语言学资料是与“王侃疏”相关，而非“疏叙”。<sup>92</sup>

这些对于我们探讨根本逊志版“皇侃叙”的真实性有什么帮助呢？首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足利抄本中不存在皇侃“叙”，但是对于 18 世纪 40 年代的根本逊志来讲，要在其他版本中找到的并不难。很多可用的版本，而且现存的二十个室町时代抄本与《总略》的惊人程度的相似，表明，在室町和德川时代的日本，一定有一个皇侃“叙”的标准版本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日本保存的另外十五个皇侃疏的版本中又为什么没有“叙”呢？为什么这些版本的抄者不能像根本逊志那样，把这篇“叙”抄上呢？看来关于它们的来源还是有些问题的，特别是《总略》的版本中，“王”侃疏和“疏叙”的内容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总略》并不是《论语义疏》的正统抄本；而《总略》的编者自己也并没有这么宣称。他们自有其用途。

其次，由于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语言学论述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是太相同了），这一发现证实曼殊院的抄本就是镰仓时代的来源，因为我们所找到的后加入的语言学内容令人迷惑。在那之后，这些内容就被当作“皇侃疏”收入了那二十种德川时代的抄本中，并在根本逊志 1750 年的刻本中被确定，又于 18 世纪 70 年代在杭州，80 年代在北京被毫无质疑地接受与并再版。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如果《总略》是现存包含这些与皇侃相关的音韵和文字学内容的最早抄本，我们仍然无法通过它找到日本晚于宋代的镰仓时代版本与早于宋代的平安时代版本《论语义疏》之间的可靠联系。<sup>93</sup>我们也无法在中国找到 18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与那三条似乎在六世纪以前已经广为使用的语言学规则相同，或者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记载。中古时代的日本抄本本身就是他们的“皇侃叙”的来源，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相信它的真实性，或根本逊志的版本。

1750 年以前，那些语言学规则只出现在《总略》和三十五种德川时代《论语义疏》抄本中的二十种内。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规则可能是晚期加进去的，也许是在镰仓时代对原始的《论语义疏》进行拆分、剪贴的时候加进去的，随后就被一次次传抄，直到根本逊志的刻本出版，使得这一内容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获得了稳固地位，随后又在杭州未经注明来源而被盗用。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任何种类的中国经典文献中，都无法找到对皇侃这一号称六世纪的语言学洞见的引用。这一看法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所谓皇侃提出的普遍的理论，却只解释了《论语》题目的用字，但在对《论语》中圣人的教诲进行疏解的时候却完全没有

<sup>92</sup> 影山辉国“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皇侃自序” 53-56 页，列出了他所追踪到的三十五种现存抄本在日本和台湾的收藏地。他还将包含皇侃“叙”二十种抄本进行了比较，并整理出一个新的校勘本，见其文 64-74 页，这一版本与武内义雄所使用的《总略》本比较接近。

<sup>93</sup> 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述论语孟子注释书考”上，35-36 页，认为《论语义疏》的室町时代抄本无法上溯到前镰仓时代的版本。



用上。<sup>94</sup>

在我们能够在中古时代的中国以及古代日本找到其他可提供年代证据的经典文本以前，我认为假定根本逊志版皇侃“叙”经由《总略》的编者，来自中古时代的日本，而非中国，还是比较合理的说法。《论语》这一本经典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东亚两种经典传统的区别。这两个地区在十八世纪为争夺文本经典的优越性所发生的文化斗争<sup>斗</sup>，为我们研究这两个平行发展的儒家经典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正是因为根本逊志整理的《论语义疏》发现于足利学校，所以它在大阪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很快被付梓，并在中国南方得到再版。服部南郭和他的徂徕派同事，与整理并出版了这一作品的根本逊志一致共同认为，传播他们新的印本对于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东亚经典研究都做出了贡献。服部南郭在他为根本逊志1750年版的《论语》皇侃疏所写的“叙”中说：“此举不仅有利于海内（日本），并将传之海外（中国），使其知我国文明虚怀若谷。有此，安知根本逊志不有功于国华哉！”<sup>95</sup>

更早些时候在日本，太宰春台已经于1737年，在他的《论语古训序》中指出，在宋代，由于程颐、程颢（1032-1085）兄弟的作用，“仲尼之教始与释氏相乱”，导致“古训遂废”。“今我国承平逾百年，修文者遍及全国，徂徕大师出而胜众人……取征于六经……式古训而有考。”太宰承认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来掌握古代的训释，才完成了这部关于《论语》的作品，他希望用这个新的，真正的版本来传播徂徕的发现。<sup>96</sup>

日本版的《论语义疏》在十八世纪晚期那么容易就被清代考据学家毫无质疑地接受，并在80年代被收入四库，是因为在这一修订本中，皇侃所阐述的内容正是这些考据学家们希望从皇侃那里所看到的。<sup>97</sup>四库馆臣——有可能是戴震——指出，皇侃这几条成熟的语言学规则证实了他们在语言学上为重建经典所做的努力是明智的。汉晋经学像皇侃的原始作品一样，曾经在南宋时代，即他们所说古文经学式微的时代失传。和太宰春台一样，乾隆的四库馆臣在收录这一新发现的文本时，也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也拒绝考虑皇侃那些来自其自身对佛教和道教兴趣的“意义重大的”方法，有可能实际上就是宋代四书五经“义理”之学的前身。<sup>98</sup>

对于经典文本从日本到中国的再输入，以及这种交流在两国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非常有且助于我们理解十八、十九世纪两国学术交流的特点，并且可能更加精确地确定从中国向日本的文化输出是在何时发生逆转的，这一反向的传播到了明治时代（1868-1912）又得到了扩展。日本人成功地从满族人统治的中国手中把儒家经典的文本的中心地位从满族人统治的中国夺取了过来。从镰仓-室町时代的抄本文化到德川时代刻本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经典以一种日本的形式获得再生。

Formatted: Font color: Red

<sup>94</sup> 我在京都大学的同事，他们中很多人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儒学的专家，当面对皇侃“叙”中其他部分的语言学观点时，认为整个的皇侃“叙”可能是晚期拼凑出来的。

<sup>95</sup> 服部南郭，《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4a-4b页。

<sup>96</sup> 太宰春台，《春台先生柴芝园稿》，4.20b-22b（139页）。

<sup>97</sup> 也有一部分十九世纪的清代考据学者对其出处并非那么有信心。

<sup>98</sup> 《四库全书》为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所做“提要”1a-2b页。关于清代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反对可参见藤塚鄰，“日本刻皇侃論語義疏の清朝經學に及ぼせる影響”，308页。关于太宰春台，见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28页。亦可见 Elman, “Philosophy (*I-li*) Vs. Philology (*K'ao-cheng*): The *Jen-hsin Tao-hsin Debate*,” *T'oung Pao* (Leiden Univ.), 69, 4-5 (1983): 175-222.